

書 評

蔡 瑩 瑩*

武致知 (Rens Krijgsman)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研究與英譯 6：《鄭武夫人規孺子》諸篇》

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24 年，288 頁，ISBN 9787302672333

At the word go we are within the multiplicity of languages and the impurity of the limit. (從一開始我們就處在語言的多元性和局限的蕪雜之中。)

—— Jacques Derrida 〈什麼是「確切」的翻譯？〉¹

史家喜言「過去是一異邦」(“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儘管語言文字大抵相沿，但因時空遙隔，過去仍充滿陌異與驚奇。由此言之，傳世或出土古代文獻，猶如一扇時光之門；隸定釋讀，便是開啟這道異邦大門的鑰匙。那麼，將古代文獻翻譯為另一種語言，可謂鍛造另一把鑰匙，打開另一扇既同且異，通往平行宇宙之門。

2025 年 5 月 6 日收稿，2025 年 10 月 10 日修訂完成，2026 年 1 月 27 日通過刊登。

* 作者係臺北市立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助理教授兼儒學中心主任。

Tsai Ying-ying,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and Director, Research Center for Confuc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Taipei.

1 Jacques Derrida, “Qu’est-ce qu’une traduction ‘relevante’?” (keynote lecture, ATLAS annual conference, November 13, 1998). 英譯見 Jacques Derrida, “What Is a ‘Relevant’ Translation?” trans. Lawrence Venuti, in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ed. Lawrence Venuti, 4th ed. (London: Routledge, 2021), see chapter 28. 中譯收入陳永國主編，《翻譯與後現代性》(北京：中國人民大學，2005)，頁 147-170。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自 2008 年起，陸續發布《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整理報告。2020 年起，由黃德寬、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主持清華簡「校釋」與「英譯」兩項叢書計畫，後者致力於清華簡之英譯，為海外／非中文母語學者提供更便利的研究資源。

本文所評《《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研究與英譯 6》（以下簡稱《英譯 6》）由荷蘭籍學者，現職北京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副教授武致知（Rens Krijgsman）翻譯。本書收錄〈鄭武夫人規孺子〉、〈鄭文公問太伯（甲、乙本）〉、〈子犯子餘〉、〈晉文公入於晉〉、〈趙簡子〉、〈子儀〉六篇，原分屬整理報告之第六、七輯。諸篇為現今學界通稱的「語類文獻」，其架構以春秋歷史人物為主，內容包含治國規訓、歷史知識、語言藝術等多元內容。《英譯》系列的體例均含研究與翻譯二部。以下即就此二端述評之。

首先，在研究章節中，作者論析諸篇之敘事架構、語類文體特色與語言藝術，皆透闢有見。敘事架構方面，第一章“Narratives about the Past”提出各篇之基本敘事要素：簡易的歷史背景，人物間的往復對話。諸篇敘事者採全知視角，簡要提點歷史場景與人物，隨即引入問答，並預設讀者都熟知相關事件與人物關係。作者認為此敘述框架或來自銅器銘文與《書》類文獻傳統。

筆者要補充的是，有關戰國時期語類文獻的討論，早在李零《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就提出過「事語」／「故事類史書」，並富洞見地指出此類材料「是諸子時代最有代表性的史書」。² 李氏作此論時（初版為 2004 年），清華簡尚未發現，但參照今日對「語類文獻」的認識，仍若合符節。又，歐美學界對先秦「軼事體」（“anecdote”）的討論，亦頗與李說呼應。如《劍橋中國文學史》指出《左傳》「存在不同的軼事傳統」；³ 牛津大學出版 *The Oxford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亦指出春秋戰國歷史敘事的「基礎形

2 李零，《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修訂本）》（北京：三聯書店，2020），頁 263-274。

3 孫康宜、（美）宇文所安（Stephen Owen）主編，劉倩等譯，《劍橋中國文學史》（北京：三聯書店，2013），頁 80。

式」以 anecdote 為單元。⁴ 葉波 (Paul van Els) 與桂思卓 (Sarah A. Queen) 主編 *Betwee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Anecdotes in Early China* 之〈序章〉也定義了此類敘事的基本結構。⁵ 《英譯 6》所收六篇語類文獻，實提供了很好的雙邊對話機會，引發我們思考先秦語類文獻的流傳與基本形式。

語類文體與語藝方面，第二章“Dialogue Dynamics”與第三章“Image-based Language”皆聚焦「語」之藝術表現。第二章探討多樣且生動的對話型態，提出三項特色：多元角色與話語權之分配，權勢與知識的辯證，修辭與人物形塑。第三章析論「圖像式語言」的藝術表現——包含明喻類比 (similes and analogies)、迂迴委婉 (periphrasis)、轉喻 (metonymy) 或訴諸特定母題 (motif) 等修辭方法。

本書論及語言藝術尤為發人深省處，在點出問答者之間的權力拮抗：身為臣屬的言說者，憑藉知識、道德與修辭，展現高於君王的話語權；而在現實中掌握生殺大權的統治者，則被描述為欠缺經驗、言談不當、亟須指引的求助者。這一觀點，在古典研究中其實並不陌生，如襄廿四年《左傳》叔孫豹著名的「世祿」與「不朽」之論，標舉「立德、立功、立言」高於「世不絕祀」的政治實權。現代中、西方學者對此亦有論述，如余英時〈道統與政統之間——中國知識分子的原始型態〉已運用多種傳世文獻為證，探討春秋戰國時代以道自任的知識階層如何對待政治權威的問題；⁶ 史嘉柏 (David Schaberg) 在 *A Patterned Past: Form and Thought in Early Chinese Historiography* 則援用尼采的「憤懣」 (“ressentiment”) 觀念，指出《左傳》、《國語》的敘述者，或來自被排除於權勢外的傳統史官族群，

4 David Schaberg, “Chines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in *The Oxford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 vol. 1, *Beginnings to AD 600*, ed. Andrew Feldherr and Grant Hard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394-414.

5 Paul van Els and Sarah A. Queen, “Anecdotes in Early China,” in *Betwee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Anecdotes in Early China*, ed. Paul van Els and Sarah A. Queen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17), 1-37.

6 余英時，〈道統與政統之間——中國知識分子的原始型態〉，《士與中國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頁 77-99。引文見頁 89。

故其敘事往往強調德智高於權勢，文辭勝於武力。⁷ 凡此皆可與本書所論話語權力結構呼應。

本書或因翻譯性質之故，對上述議題並未完全開展論述，讀者或可進一步參看本書作者之專書與研究論文。此外，本書對歷史敘事與詮釋的研究方法與觀念，頗能體現中西學者看待出土文獻的微妙不同。本書收錄各篇之人物與歷史，多能與傳世文獻如《左傳》呼應；但作者指出，既無明顯的證據支持諸篇與《左傳》之間有平行文本要素（paratextual features）或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則也不必然要將傳世文本視為理解出土文本的詮釋框架，而更希望突顯清華簡諸篇的獨立價值。

其次，出土文獻英譯，亦即從上古漢語轉換到現代英語，實經歷了不止一重的「翻譯」，而每一次翻譯，都是盤桓在文本危崖邊的挑戰。不過，出土文獻英譯的優勢或許在於，翻譯者與現代釋文註解者，乃至於讀者，幾乎站在同一條起跑線上，不必然要回應或加入某些詮釋傳統，或能減少些「影響的焦慮」。⁸

本書在翻譯與研究方面，廣泛參考當代學者專家釋讀，是其顯著優點。然而，出土文獻英譯也有幾項挑戰：一、某些字詞，學界意見尚不穩定乃至無共識。譯者必然要做出選擇或自行詮釋，則本書的西方讀者——尤其是非文字學領域專家或初學者——逕行閱讀英譯，是否會錯過了釋讀、討論的過程？二、語言本身有其歷史，新出文獻在詞彙語法，仍與傳世文獻有相通的時代痕跡。⁹ 正如作者所言，出土文獻絕非「在真空中創作」（頁 39），其曾與傳世文獻處於相同時空，甚至擁有共同素材與關懷議題，則英譯仍需顧及語言文化的歷史積累。三、歐美學界翻譯中國典籍，實已有數百年的傳統，

7 見 David Schaberg, "Writing and the End of History," in *A Patterned Past: Form and Thought in Early Chinese Historiograph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1), 256-312.

8 《左傳》英譯就是很好的對照，我們可想見，《左傳》翻譯的某些字詞，恐怕會面臨「為何不採用杜預《注》？」或「為何採用某人註解」的疑問。而譯者就必須針對特定字詞或議題，進行千年以上的學術意見梳理。

9 當然，當代學者對出土文獻進行校釋時，多能妥善運用既有的古代漢語知識，此一優點也為本書所承繼。

出土文獻英譯雖與傳世古典略有不同，但或許仍參酌此翻譯傳統，也應思考建立原則或體例。以下試舉二例，藉此思考出土文獻英譯與詮釋的難題。

第一，先秦語言文字之運用，經常有「多義性」的表現，以〈鄭文公問太伯〉的「問」字為例。本書敏銳地注意到該篇以「問疾」為背景，並以「臨終敘事」(“deathbed narrative”)稱之。本篇開頭：

子人成子既死，太伯當邑。太伯有疾，文公往問之。君若曰：「伯父，……」。

After Ziren Chengzi had passed away, Grand Elder was in charge of the city. Grand Elder had an illness, and Lord Wen went and asked him about it. The ruler said “Sir Bo [...].”¹⁰

「往問之」譯“ask him about it”，不同於英文有明確的間接賓語 him 與直接賓語 it，中文僅有一代詞「之」。試問：「之」指的是「太伯」，還是「疾」呢？就英譯言，it 顯然是「疾」，「問」則譯 ask，意為「太伯有疾，鄭文公前往詢問他（的病況）」，亦即「疾」是文公所要「詢問」的事項。

然而，中文的「之」當然可以指「人」，且在此語境中，「問」當解為「存問、慰問、探視」義較切。朱忠恆《集釋》與王榆禎的研究¹¹就很準確地引用了《論語》〈雍也〉「伯牛有疾，子問之」為證，即伯牛病，孔子探訪、慰問伯牛。「問」之二義，由《禮記》〈坊記〉可見：

男女授受不親……婦人疾，問之，不問其疾。¹²

前「問」即「慰問、探視」義，後「問」才是「詢問」病情義。就此而言，「文公往問之」翻譯成「文公前往慰問太伯」即可。

10 《英譯 6》，頁 128。

11 朱忠恆，《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陸）集釋》（武漢：武漢大學歷史文獻學碩士論文，2018），頁 66；王榆禎，《《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陸）》鄭國史料三篇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18），王書進一步舉出「往問之」、「親往問」等先秦詞例（頁 198-199）。

12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影印清·嘉慶二十年〔1815〕江西南昌府學刻本，1976），卷 51，頁 27。

進一步言，筆者以為此篇饒富趣味的對話張力即在於此：儘管文公之言部分有缺，但誠如作者指出，「君若曰」仿擬書體訓誥，突顯上位者的話語權；且若參照《左傳》載錄，鄭文公可說從未聽從臣子建言。故此處文公之「問」，「慰問示惠」概多於「求教詢問」，且慰問是「表」，話語「裏」之意圖則彰顯君臣權力位階，提示太伯對公室忠誠與擁護。又，太伯對文公並不領情，反而幾乎可謂疾言厲色，稱文公未能「慕吾先君」、「不善」。換言之，雙方實非典型的「君問臣答」，而更像是兩段君臣異心的「獨白」。¹³ 更有趣的是太伯最後一段話：

君如是之不能懋，則譬若疾之亡醫。君之無問也，則亦無聞也。¹⁴

釋文雖有「問／聞」之別，但簡文字均作「𠬪」，體現了先秦「一字多義」的語言藝術表現。¹⁵ 太伯指責文公如「疾之亡醫」，此時雙方身分翻轉：命在旦夕的太伯，盡責提出治國良方，但真正沈痾難救的，是不聽諫言的文公。「𠬪」字呼應「疾」主題，既有「慰問」義，又因將良臣建言比擬良醫善藥而有「詢問」義與「聽聞」義。就此言，再好的翻譯，恐怕也難以呈現此種一字多義之語藝妙用。

「問」之翻譯雖是細節，然荃蹄所寄，唯在文言。若一常見的「問」字都可能有多元解釋，遑論其他尚有爭議、甚至隸定都未有共識的詞彙。¹⁶

13 作者亦指出太伯之語近乎「獨白」，但未提及鄭文公。

14 《英譯 6》，頁 139-140。

15 有關此議，學者已有不少論述。參看鄭吉雄，〈「革」卦「己日乃孚」辨正——再論《周易》異文與一字多義〉，《中國典籍與文化論叢》23 期（北京：鳳凰出版社，2021），頁 1-12；范麗梅，〈郭店寫本引〈詩〉與儒學經典詮釋意義的形成〉，《中國文哲研究集刊》57(2020.9): 103-142。

16 略舉三例言：1. 〈子儀〉篇的簡序，目前似尚未定論，譯者必然只能選擇其中一種，而這就牽涉到許多特殊詞彙如「丹方」的斷讀與構詞問題。2. 〈鄭文公問太伯〉的「太」字作「𠬪」學者頗疑其當為氏族名，而非一般尊稱的「大／泰」用法。3. 〈鄭武夫人規孺子〉的「規」字，一般解讀為「規勸」、「勸諫」，本書也做此翻譯，但此義似乎不太適用於下文的「邊父規大夫」，故張宇衛曾提出「規」為「為動」用法，當理解作「為……規劃」的「籌謀」義。見張宇衛，〈《清華六·鄭武夫人規孺子》札記〉，《政大中文學報》33(2020.6): 249-288。

透過此例，更可認識翻譯之不易。又，上述筆者對〈鄭文公問太伯〉的詮釋，據《論語》、《左傳》、《禮記》等傳世文獻，作為理解鄭文公與太伯對話的知識與歷史背景，這或許正是本書作者較不願採取的方法。本書作者希望呈現出土文獻獨特的敘事價值，固可理解，但若傳世文獻的歷史背景與文化知識恰能「合則雙美」，又有何不可呢？

第二，讀者可能會注意到，上文鄭文公稱太伯為「伯父」，本書譯為“Sir Bo”（回譯中文，概是「伯大人」），此翻譯略不符一般對「伯父」的認識。惟作者在〈前言〉已指出稱「父」者，「保留了父權與階級意味」（頁29），故稱 Sir，如〈鄭武夫人規孺子〉的「邊父」“Sir Bian”、〈子儀〉的「儀父」“Sir Yi”等。問題在於，「太伯」在本書翻譯為“Grand Elder”，這就形成同一「伯」字有“Elder”跟“Bo”兩種翻譯；又上述「儀父」即「子儀」，就出現同一人既稱“Sir Yi”又稱“Mr. Yi”，前者顯示身分尊貴，後者僅屬表達禮貌的前綴（courteous prefix）。

這些略不一致的人名翻譯，實無法深責譯者，因為古代中國人名本即是翻譯難關：古者姓、氏、名、字各異，因應語境還有自稱、尊稱、爵稱、謚號等，同一人物在古籍有四、五個不同稱呼，乃家常便飯。對於非專業讀者來說，絕對會造成閱讀上的阻礙。而譯者的兩難正在於：若將人物統一稱呼，則不忠於原文；若堅持對應原文翻譯，則幾乎是將非專業讀者拒於門外。以杜潤德（Stephen Durrant）、李惠儀、史嘉柏《左傳》新英譯的人名翻譯為例，其在譯文中統一稱呼，另以加註方式說明原文的其他稱謂，並製作了近百頁的「人名索引」¹⁷ 附於書末供讀者查詢。

整體而言，本書內的人名諸如「父」“Sir”、「叔」“Uncle”、「公」“Lord”（少數用“milord”）、「子某」譯“Mr.” 某（如子犯、子餘），作為謚號的趙簡子、成子則音譯“Zi”，皆體例一貫。至於選用詞彙是否恰當，讀者可自行評斷。筆者要指出的是，本書既屬英譯叢書之一，未來或仍須整合清華簡所有人名譯法。舉例言，本書「公」譯“Lord”，但同系列英譯第

17 Stephen Durrant, Wai-ye Li, and David Schaberg, trans. and introduced, *Zuo Tradition / Zuozhuan 左傳: Commentary on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6). “Personal Name Index,” 2053-2147.

一冊《逸周書諸篇》，如周公、召公、祭公、晉文公等，均譯“Duke”。再參照《左傳》英譯，「公」的譯法分為生時的爵稱“duke”，與死後的謚號“lord”。¹⁸ 再如作者指出，「子」譯“Mr.”，乃為避免如莊子、墨子等哲學家“master”的誤解（頁 29），這個顧慮在歷史類文獻中，其實不常發生，如英譯《左傳》“master”通常用於爵稱，如楚子“the Master of Chu”、吳子“the Master of Wu”等，¹⁹ 至於「子某」或「某子」等名／字，均音譯“Zi”。當然，清華簡的英譯未必要依循《左傳》，但如前所述，西方英譯中國古典，早有長遠歷史與佳績，適度參照若干原則，也不失為學術薪傳之佳話。更何況，我們仍期待《繫年》、《楚居》、《越公其事》的英譯，其中眾多人名該如何整合，又如何讓英語讀者快速進入文本而非困惑於複雜多變的稱謂，大概是本系列《英譯》的挑戰之一。

本書之英譯為出土文獻之國際化，提供了重要典範，上述翻譯個案，以及少數仍有調整空間之處——如「穀」音譯或當作 *yao* 而非 *xiao*；²⁰ 頁 44 言及〈鄭武夫人規孺子〉之鄭莊公，誤植為「鄭文公」；頁 50、52 處引用若干簡文英譯，依本書慣例似應中英並陳；〈晉文公入於晉〉的「明日朝，屬邦耆老」，「屬」為動詞，可解釋為「會集」或「叮囑」義，²¹ 但本書似未譯出或譯為介詞（with the elders of the state）——相較於本書作者付出的心力與細膩考慮，可謂小管不足以掩大德。

綜上所論，本書選錄六篇語類文獻，透過細緻的敘事分析與語言藝術探討，呈現戰國時期歷史書寫與知識建構的多樣面貌。譯者兼具中西語文能力與學術訓練，準確捕捉敘事微妙處與修辭技巧。儘管部分翻譯仍

18 Durrant, Li, and Schaberg, *Zuo Tradition*, XXXVII.

19 案：本書引用《左傳》英譯即根據上述杜潤德等英譯《左傳》。然而本書頁 188 引用僖廿七年《左傳》「楚子將圍宋」一段文字，英譯《左傳》的「楚子」譯作“the Master of Chu”（見 Durrant, Li, and Schaberg, *Zuo Tradition*, 400-1），本書引文卻誤引作 the “Prince” of Chu，未知是否為校對時發生的失誤。

20 案：「穀」表示地名或「菜餚」，一般音 *yao*。作「混雜」義時音 *xiao*。見《漢語大字典》，頁 2316。由於本文所言為戰爭地點，當音 *yao*。

21 案：相關用字可見《繫年》第 20 章「始為長城於濟，自南山逗（屬）之北海」，亦作動詞用，為連續義。

有討論空間，反映了出土文獻英譯的複雜與困難，但正如本書作者所言：
“Through comparison, the familiar becomes problematic, allowing us to see
writing about the past in a new light.” (頁 38) 隨著本書的翻譯與其所揭示
的先秦語藝，期待更多國際研究者，共同探尋過去此一「異邦」。

